

當代中國大城市方言文化的幾個特點

——以北京市為例*

劉曉海

[提要] “方言文化”是指用特殊方言形式表達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現象。本文以北京市為例來討論當代中國大城市方言文化的幾個主要特點，包括方言形式與文化事項具有同一性、方言文化的生命期參差不齊、地域差異大、層次複雜、極度瀕危等。科學地保護大城市方言文化，需要全社會的重視和努力參與，為此北京語言大學已經啟動了“中國方言文化典藏”項目，並針對大城市方言文化的特點，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工作方案。

[關鍵詞] 方言文化 大城市 當代 北京 典藏

[中圖分類號] H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2) 03 - 0069 - 08

本文討論的“方言文化”，是指“用特殊方言形式表達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現象，包括地方名物、民俗活動、口彩禁忌、俗語諺語、民間文藝等”，可具體分為“房屋建築、日常用具、服飾、飲食、農工百藝、日常活動、婚育喪葬、節日、說唱表演”等九個大類。^①

“城市”一般是指與農村相對的以非農業生產為主要活動、主要由非農業人口聚居形成的較大居民點，而本文所說的“城市”則主要是指按照國家行政區劃所確定的既包括城區也包括鄉村的縣級以上地域單位。至於“大城市”，通常是指經濟較為發達，人口較為集中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目前對大城市的具體劃定標準卻並不明確。2008年初改後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中沒有關於城市規模的界定條文。2010年出版的《中小城市綠皮書》將市區人口在100萬~300萬的劃定為大城市，但並未包括郊區和鄉村。參考上述材料，本文對大城市的界定是“歷史較為悠久、全市常住人口在500萬以上且流動人口較多的城市，多為全國性或地區性的經濟、政治或文化中心”。這樣基本上可以涵蓋全國的省會級以上城市。北京有3,000餘年的建

* 本文係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方言文化典藏》（項目批准號：11JZD035）和北京語言大學青年自主科研支持計劃資助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基於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料庫的方言音特徵量化比較研究”（項目批准號：09JBT06）的階段性成果。

城史，自元代開始成為全中國的首都，截至2011年底常住人口達到2,000萬，流動人口超過1,000萬，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無論從歷史、人口、文化、城市地位等各個方面來看，北京都是大城市的典型代表。“當代”是指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的這一段時期。

下面以北京市為例來討論當代中國大城市方言文化的幾個特點，其中第一部分為方言文化的基本性質，並非大城市所獨有，因其重要，在此一併介紹。

一、方言形式與文化事項具有同一性

方言文化從表層形式上看，與方言和地方特色文化均密切相關，但它既不是方言的子集，也不是民俗文化的子集，而是一個獨立的研究範疇。從上文定義中可以看出，方言文化應當是方言和地方特色文化交叉融合的部分，其落腳點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事項，但同時這些事項又必須用方言形式表達出來。方言形式和地方特色文化事項都是方言文化的必備條件，二者有機結合，不可分割。也就是說，方言文化的方言形式（無論是文字的、有聲的或影像的）和所對應的地方特色文化事項（包括靜態的或動態的）必須要共現，兩者具有同一性。脫離了方言形式的地方特色文化事項，或者無法體現文化事項實際面貌的純語言形式，都不算是真正的方言文化。正是方言形式與文化事項的同一性，把方言文化與傳統的方言學和民俗學研究對象區分開來。

方言文化雖然從形式上來看是對某一文化事項配以方言說法，但卻並不是兩者的簡單相加，其內涵遠超於此。從方言對文化事項的影響來看，附帶方言形式的文化事項更具有真實性，能在當地人心中激發更為強烈的文化和心理認同感。從文化事項對方言的影響來看，方言形式與文化事項原貌的同步呈現更能體現出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能進一步拓展對語言形而下的研究。從功效上看，方言與文化的結合起到了1+1>2的作用。

雖然方言文化與方言和地方特色文化都有區別，但並不妨礙它們具有可互相借鑒的研究方法或共同的觀察角度。比如在判斷某一事項是否為方言文化時，可以僅從是否為地方特色文化的角度來考察。例如，近些年新建的城鎮居民住宅樓房，在全國基本上都是一個樣子，雖然各地的方言說法可能不同，但卻體現不出當地的文化特色，因此不屬於典型的方言文化。再有，各地特有的動植物也不屬於方言文化的研究對象，因為它們是自然資源，不是人民生產生活的結果，同樣缺乏文化性。另外需要指出，雖然方言文化強調同一性，但在對其進行稱說時，仍然可以只使用方言形式，不一定非要同時展示文化事項。

二、方言文化的生命期參差不齊

任何一種語言或文化都具有生命期，方言文化也是如此。所謂生命期就是從事物產生到消亡的時間段。本文考察的對象為當代方言文化，如何判斷是否為“當代”？一般來說，只要在當代（1949年到今天）存在過的方言文化都屬於當代方言文化，即應當根據方言文化生命期的結束時間而非產生時間來判定。那麼，在當代仍然“存在”但只能在博物館裡才會看到的東西，如古代的官服、出土的文物，是否也應當算作是當代方言文化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雖然它們的物質外殼依然存在，但生命卻早已結束，留存到今天的只是遺骸。只有那些在某一時期存在並仍然被使用的事物，才能算作是當期的方言文化。這類事物可以稱之為“活態”的。^②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事物今天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在1949年之後還依然為活態，例如，油燈和舊時商鋪的老帳本，在今天已經徹底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但在1949年以後仍在民間普遍使用了很長一段時

間，它們也屬於當代的方言文化。總之，當代方言文化是指那些在1949年以後仍然存在並被使用的（活態的）方言文化現象，無論其在今天是否仍然為活態。而1949年以前已經消亡的事物則不屬於當代方言文化，例如元、明、清幾代的官服，它們在1949年以前就已經全部變成了非活態。

此外，從1949年到今天的幾十年間，中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漸變的，而是表現為界限分明的多個階段的突變。這就導致在1949年之後，甚至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產生了許多新的方言文化現象，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很快又退出了歷史舞臺。尤其是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由於經濟發達、人口流動大、社會變革快，與其他地區尤其是農村或小城市相比，文化新陳代謝的速度更快，方言文化的基本面貌也更加不穩定，因此導致了大城市方言文化事項的生命期參差不齊，複雜多樣。

以生命期為劃分標準，方言文化可分為如下幾種類型：

(1) 產生於1949年之前，至今尚存的。如部分傳統節日的民俗活動、舊式住宅建築等。

(2) 產生於1949年之前，1949年之後消亡的。如傳統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方式，舊時的部分日常用具，出殯的形式等。

(3) 產生於1949年之前，在1949年之後消失了一段時間，後來又復興的。如春節期間的廟會活動、部分民間手工藝等。

(4) 產生於1949年之後，至今尚存的。如軍隊大院、城市居民平房等。

(5) 產生於1949年之後，已經消亡的。如“大字報”等。

(6) 產生於1949年之後，消失之後又復興的。如“北冰洋汽水”等部分地方知名產品。

其中第(1)類更多地存在於農村地區，第(2)(3)兩類在大城市中相對較多，(4)

(5)(6)三類則主要集中在於大城市。

關於方言文化的後三種類型，還面臨著一個劃界歸屬問題。以商品為例，上文所說的“北冰洋”汽水由於承載了本地人對那個年代的記憶和情感，因此會被認為本地的方言文化，但其他的尤其是新近出現的本地商品則不見得會被看作是本地的特色文化。那麼，問題就是存在多久的事物才能成為當地方言文化的一部分？這可以分成兩類來討論：一是已經長期存在的，僅通過它們存在的時間就可以確定的，比如民俗活動；另一類是存在時間不長，從產生到現在只有幾年到幾十年不等，無法單純依靠時間來進行判斷，必須通過當地大多數人的主觀感受來判斷。

三、地域差異大

大城市地域面積廣，從城市形態上看大都包括城區、城郊、鄉村三類地區，而且大多歷經過行政區劃的改變，因此其方言文化也必然會存在較為明顯的地域差異，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城鄉差異，其次也包括核心區和邊緣區的差異。

以北京為例，從古至今，北京市的轄區面積已經擴大了很多。全市目前共有14區2縣，總面積1.6萬多平方公里。市內各區縣的行政區劃也多次發生改變，許多曾經的農村地區也變為了城區。20世紀50年代是北京市的主要擴展期，在此期間原屬河北省的多個區縣陸續劃歸北京，例如：

1952年7月，房山縣部分劃歸北京市。

1956年3月，昌平縣劃歸北京市。

1958年3月，通州、順義、大興、房山等縣劃歸北京市。

1958年10月，懷柔、密雲、平谷、延慶等縣劃歸北京市。
最終形成了今天的“大北京”地域範圍。

而在明清兩代，北京城僅包括今天二環路以內的地區，分內城和外城兩部分。直到民國，此格局也未有太大變化。北京城內和城外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差異非常大。例如，城內大戶人家門前的上馬石（大門外兩側擺放的供人用腳踩著坐到馬背上用的臺階式石塊）和商業老字型大小“瑞蚨祥”綢布店等就不會出現在城外地區；而農耕活動以及碾子、紡車、犁等用具在城內則較為少見。可以說，城內的生產生活方式體現出鮮明的京師文化特色，而城外則為非典型的農耕文化模式。之所以稱之為非典型，主要是因為與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耕文化不同，雖然北京周邊的鄉村也向京城提供一些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但城內所需的主要大宗物資卻是通過“漕運”等方式從外省市調入的。與之相反，北京周邊的鄉村卻對京城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如若沒有京城的存在，城外農村地區雖然不會讓人無法生存，但其文化面貌必然會發生極大的改變。

由於舊時北京城內外經濟、政治、社會、人文等各方面差異都非常大，所以城內外人民相互之間的心理認同感也不強，城外地區也就不會被視為北京城的一部分，城門一關，涇渭分明。因此，雖然城內外的方言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還是伴隨著社會主體的地理和心理分離而成為兩種不同的類型。

從方言的角度來看，今天北京市內部也存在著區域差異，具體體現在方言區片的劃分上。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寫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北京地區的方言主要包括北京官話和冀魯官話，後者只分布在平谷區（原屬河北省）。而北京官話內部又可分為京師、懷承兩個方言片，其地理分布是：

（1）京師片，分布範圍較廣，主要分布在主城區、近郊區和部分遠郊區，包括東城區、西城區、海淀區、朝陽區、石景山區、昌平區、通州區、順義區、豐台區、大興區、房山區、門頭溝區；

（2）懷承片，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幾個遠郊區縣，包括懷柔區、密雲縣、延慶縣。

既然今天北京方言文化的兩個必要條件方言和民俗文化事項都存在顯著的內部地域差異，那麼在進行研究時就需要釐清它們的內部關係，注意區分城鄉差別以及核心區與邊緣區的差異。

四、層次複雜

所謂層次性，是指來源不同、性質不同的多種現象或事物能夠疊加在一起共同存在，劃分層次可以有多種標準。大城市由於歷來人口流動頻繁，容易發生劇烈的政治經濟變革，因此與小城市或農村相比，其方言文化的層次性更為明顯，劃分標準也更為多元化。例如，北京方言文化的分層主要可以從社會階層、城市功能、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和移民等角度進行觀察。

1. 社會階層

社會上層人士與底層民眾的生活方式差異會明顯地體現在方言文化中，比如舊時庭院大門的款式按照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可分為廣亮大門、金柱大門、蠻子門、如意門和普通的牆垣式門。其中廣亮大門、金柱大門為身份地位較高者才能使用，有門樓、門洞、門前臺階以及門上的各色裝飾物。蠻子門和如意門的樣式明顯要比廣亮大門和金柱大門簡樸，一般沒有門洞和臺階，說明主人的身份地位要更低一些。而普通牆垣式門就是在院牆上直接開門並配以少量裝飾物品或者無裝飾，只用於社會底層的普通老百姓家庭。此外，大門門楣上的柱形裝飾物“戶對”也有體現主

人身份地位的作用，例如在舊時相親時通常講究男女雙方要“門當戶對”，這個“戶對”就是由此得名。戶對一般有4個和2個之分，4個戶對說明主人地位更高，一般有4個戶對的人家不與只有2個戶對的人家結親。

2. 城市功能

北京作為全中國首都的時間超過800年（始於元代），而作為軍事重鎮、邊防要塞的歷史則更久（始於秦漢），於是北京便長期具有多元化的城市功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同時也是軍事中心。因此，在很多方言文化現象中都能看到京師文化和軍旅文化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例如，北京內城的北門有兩個，分別是德勝門和安定門，對此二門的命名就源自與北方軍事勢力的長期戰爭。北京作為首都同時也是北伐的軍事大本營，通常在每次出征前軍隊都會在城內集結而後從德勝門出城，戰爭結束後必定從安定門返城，為了博得好彩頭，於是寄語“德勝”與“安定”二詞，兩門的名稱也由此而來。此外，從今天保留的德勝門箭樓可以看出，北京各大城門的城樓與其他城市相比更加雄偉壯觀，同時又非常實用。究其原因，一是可以展現首都的宏偉大氣，二是由於北京在歷史上多遭戰亂，也的確需要極其堅固的城防以抵禦外敵。

3. 民族成分

這裡只討論那些長期定居在北京、已不說本族語言且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主要包括回、滿兩族。北京長期由少數民族政權統治，因此回、滿等民族的文化在本地區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並逐漸和漢族文化融合在一起，共同發展。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具有回族特色的飲食和具有滿族風格的服飾。例如，回族同胞對豐富北京的飲食文化尤其是小吃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驢打滾、切糕、焦圈、薑絲排叉、艾窩窩、糖卷果、麵茶等都是老北京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而滿族的很多食品 and 服飾也已被漢族和其他民族所接受，例如“薩其馬”就已經成為全國各地老少皆宜的甜點，而旗袍則更是深受人們喜愛，甚至已踏出國門走向海外。

4. 宗教信仰

中國歷來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多數時期，統治階級都未對宗教進行太多限制，甚至在滿足自身利益的情況下還會鼓勵其發展，且無論支持哪一派，都不會採取極端手段來對待其他教派。於是各宗教得以在共生中不斷進行自我改造，以適應社會的發展要求。自唐代起，儒、釋、道三教開始出現合一的趨勢，在明朝時期得到了深入發展，最終形成了今天儒、釋、道共同繁榮的局面，宗教文化在這一過程中也逐漸滲透到人民大眾的生活中。這種現象在大城市裡表現得更為明顯。在北京，孔廟（儒）、雍和宮（釋）、白雲觀（道）並立繁榮就是三教共生的最好例證。此外，許多民俗節日和活動也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例如農曆七月十五，民間稱“鬼節”，道教稱“中元節”，佛教稱“盂蘭盆會”，在此日舉行的民間活動雖然各不相同，有的燒紙祭祀，有的做法事，有的放河燈，但都以紀念過世之人為目的，以奉親、敬養、普渡為宗旨，在這一點上各派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5. 移民

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極易造成文化與方言的接觸與融合。大城市人口流動本就頻繁，且北京作為軍事要地和國都，為兵家必爭之地，歷經多次戰亂，數為空城，以致於目前在北京很難找出祖上三代全為本地人的家庭，可以說北京的人口來源異常複雜。此特點在北京方言中也有所體現，比如北京話古清入字今歸調情況非常複雜，根據對《漢語方言地圖集》語音資料庫中常用字讀音進行的統計，全清入今49%讀陰平、22%讀上聲、22%讀陽平、7%讀去聲，次清入58%讀陰平、

24%讀去聲、18%讀上聲，這種雜亂的情況很有可能是外來移民方言對當地方言的衝擊造成的。在民俗文化方面能夠發現更多由於移民所導致的不同層次，比如北京菜系主要是以北方菜為基礎融合各地風味後形成，其中山東菜和清真菜佔有非常大的比例。京醬肉絲和宮保雞丁兩道菜品就是從山東菜發展而來，而北京名吃“東來順”涮羊肉則屬於典型的清真菜。

由上可見，北京方言文化的層次複雜多樣，且互相疊加並糅雜在一起，因此在進行方言文化研究時需要對其進行區分。

五、極度瀕危

大城市經濟發展速度快、人民生活水平較高，可以較好的體現出一國的現代化文明程度，但是往往也面臨著由於社會劇烈變革、多元文化強烈碰撞而導致的傳統方言文化快速衰亡這一嚴峻現實。

通過前期在北京市的調研，我們發現在前文所述“房屋建築、日常用具、服飾、飲食、農工百藝、日常活動、婚育喪葬、節日、說唱表演”等9個方言文化大類中，對“日常用具、服飾、農工百藝、婚育喪葬”等4類的調查難度非常大，即便是在與外省相鄰的市郊邊緣地帶也很少有保存完好的情況（此類事物相對來說在農村或小城市保存下來的應當更多一些）。而“房屋建築、飲食、日常活動、節日、說唱表演”等其他5類中的許多事物也正在迅速消失，例如春節期間的傳統活動，比較通行的如吃餃子、放鞭炮等還保留，但是祭灶、回娘家等活動已經非常少見，甚至連年夜飯、放鞭炮這樣的標誌性活動在形式上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年三十吃年夜飯時人們已經流行在外就餐，而鞭炮的樣式也已經從傳統的一串式變成了禮花式。這些都體現了大城市方言文化處於極度瀕危的狀態。

對此可能會有人提出疑問：“普通話就是在北京話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對北京方言文化的保護應當是有利的條件才對，為何會瀕危呢？”首先，普通話不等於北京話，北京話是方言，而普通話是“以北京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作品為語法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兩者並不相同。其次，由於方言文化的基本性質是“方言形式與文化事項具有同一性”，當文化事項不斷消亡減少時，方言也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

六、對策

面對大城市方言文化變得極度瀕危這一嚴峻現實，亟需全社會對此問題加以重視並積極進行保護，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科學地開展搶救性調查工作。北京語言大學於2010年啟動的“中國方言文化典藏”項目就是為解決這一問題而開展的具有實際意義的科研舉措，目前該項目已被列入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調查地點除北京外，還包括其他15個地點，內含1個少數民族方言文化調查點），說明此問題已經開始被官方和學界所重視。

此外，針對上文討論的當代中國大城市方言文化的幾個特點，在“中國方言文化典藏”項目的工作規範中均制定了具體的應對方案。

1. 針對方言形式與文化事項具有同一性

要求在調查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事項時須記出其獨特的方言形式，不能只用普通話或當地通語記個大概。例如，北京特色小吃中有一種點心叫“驢打滾”，是用黃米夾豆餡卷成的長卷，外

面粘上豆麵，記錄該物品時不能只記作“用黃米和豆沙餡兒做的糯米糕”或“一種糯米糕”，而應當記為“驢打滾”並配上國際音標“ly³⁵tA³⁵kuər²¹⁴”。同時要求對發音人的發音過程錄音並攝像，對驢打滾進行拍照。

2. 針對方言文化事項的生命期參差不齊

首先，規定只調查當代的方言文化現象，1949年以前就消亡的內容暫不處理。其次，將第二節中（1）（3）兩類方言文化確定為重點調查內容；對第（2）類內容可以根據情況靈活處理，比如請人專門演示；對（4）（5）（6）三類進行拓展調查，儘量搜集但單獨保存成類。

3. 針對由於行政區劃改變等原因而導致的方言文化地域差異大

選擇多個調查點，匯總各點調查結果後作為當地方言文化的綜合性代表。此方法的優點在於能夠搜集到更多的材料，覆蓋面更廣，代表性更強，但面臨的問題是要考慮如何兼顧城區、郊區、鄉村三者的關係以及調查比重，並且還要對調查結果按地域進行分類和說明。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北京市進行調查時，規定調查範圍可包括城區周邊的市轄區，並且按照先城區後鄉村、先核心區後邊緣區的原則進行調查，如果在城區或核心區調查不到合適的內容，再到鄉村或邊緣區進行補充。嚴格說來，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劃入北京的區縣不應作為北京方言文化的首選調查區域，但如果在其他地區調查確實存在困難，也可以考慮將這些區縣作為備選調查點進行補充調查。

4. 針對方言文化複雜的層次性

對《調查表》進行合理設計，調查條目從上到下分為大類、中類、小類等3個層次，小類下面還包括帶有說明信息的提示性條目。通過細化調查內容的分類，把釐清方言文化內部層次的任務前移到正式調查之前，減輕調查時的工作量和複雜程度。

七、結語

無論對大城市的方言還是民俗文化進行調查研究，國內外學者都已經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大量的文獻資料可供參考。對北京話進行研究歷來是漢語方言研究的熱點之一，前人無論是在語音、詞彙、語法、語言應用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貢獻；而研究北京民俗的論著更是汗牛充棟，在名物、活動、風俗等各個方面都有涉及。例如，建築類的四合院、胡同、門墩研究，農工百藝類的老北京行當研究，民俗活動類的婚喪嫁娶和傳統節日民俗研究，等等。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我們要開展大規模的方言文化保存和保護工作，首先要從這些豐富的資源中盡可能汲取養料，但同時更需要進行創新，在研究思路、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進行大膽的嘗試。

1. 思路創新

以往的方言和民俗文化研究多限於學理研究，即便產出了應用價值很高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供學術界使用，缺乏產學研轉化的機制和管道，因此較少能迅速惠及社會大眾。“中國方言文化典藏”項目一開始便將研究目的確定為面向大眾，服務社會，以調查保存方言文化為主，以二次開發和研究為輔，讓更多的人能夠分享第一手的研究資料。甚至可以降低研究門檻，鼓勵普通民眾參與到調查搜集活動中來，逐步形成分享與貢獻良性互動的局面。

2. 內容創新

方言文化的調查內容是“用特殊方言形式表達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現象”，強調方言形式與文化事項的同一性，與以往單純的方言研究和民俗文化研究完全不同。此舉既能夠提高方言研

究的社會認可度，又能夠深入挖掘民俗事項背後更深層次的人文內涵，激發其在人們心中的文化心理認同。

3. 方法手段創新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斷改進。與傳統的紙筆調查加錄音的方式不同，現在應當採取紙筆、錄音、照相、攝像全程配合的調查方式，這樣才能保證真實再現方言文化的原貌。同時，對錄音、照相、攝像均應採取統一的標準和高品質要求，例如攝像時要統一採用高清攝像機按1920*1080/50i的模式進行拍攝，視頻文件存儲方式和命名都要嚴格遵守統一的規則。這樣既可以保證多媒體素材的高品質和通用性，也便於後期對大規模資料進行管理、開發和研究。

①②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中國方言文化典藏·調查手冊》（待出版），第50頁；第4頁。

參考文獻：

[1]曹志耘主編：《漢語方言地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2]常人春：《紅白喜事——舊京婚喪禮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

[3]定宜莊：《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4]高曉虹：《北京話古清入字歸調歷史及成因考察》，北京：《語言教學與研究》，2003年第4期。

[5]侯長春繪、王露平編：《畫說老北京》，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

[6]黃濤：《語言民俗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7]老北京網，<http://www.oldbeijing.net/>

[8]王彬、崔國政輯：《燕京風土錄》，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年。

[9]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香港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1987年。

作者簡介：劉曉海，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83

[責任編輯 劉澤生]